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研究的进展、逻辑与展望

向洪爱, 李春霞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财经商贸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8日

摘要

本文旨在把握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领域的研究进展,梳理该领域的理论脉络与核心争议。以“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2022年12月以来刊发的文献,经逐级筛选确定8篇核心期刊论文与4篇高下载量、高被引普通期刊论文作为核心分析样本,并以3份政策文件为互证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作三级编码。研究发现:既有研究围绕内涵特征、价值功能与现实困境已形成共识性认识;共生理论、资源理论与现代组织理论分别从结构整合、资源机制与组织设计层面拓展了理论纵深,但三者缺乏实质性对话,实践中心从“场所”向“枢纽”跃迁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充分解释。据此,本文构建“结构-过程-设计”三维整合分析框架,阐明三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与潜在张力,演绎出四条可证伪的研究命题;进而按照“理论深化-方法拓展-视角补位-议题延伸”的逻辑提出未来研究纲领,将框架维度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及可观测指标一一对应,形成可操作的研究议程。

关键词

产教融合,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内容分析法, 文献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Logic and Prospects of Ope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 Centers

Hong'ai Xiang, Chunxia Li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ourism, Chongqing

Received: August 1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8, 2026

文章引用: 向洪爱, 李春霞.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研究的进展、逻辑与展望[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9): 326-338. DOI: 10.12677/ve.2026.159398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research on ope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 centers in China, tracing the field's theoretical threads and core debates. Taking “ope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 center” as the subject term, we searched CNKI for literature published since December 2022. Stepwise screening yielded 8 core-journal articles and 4 highly downloaded, highly cited general-journal articles as the core analytical sample, while 3 policy documents served as corroborating texts; content analysis with three-level coding was then appli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xisting studie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er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value function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Symbiosis theory, resource theory, and 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 have each added theoretical depth from the angles of structural integration, resource mechanisms,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yet the three perspectives rarely engage with one another, leaving the micro-level mechanisms behind the centers' transition from “venues” to “hubs” inadequately explained. We therefore construct a “structure-process-design”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which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and potential tensions among the three theories are clarified, and four falsifiable research propositions are derived.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oretical deepening, methodological expansion, perspective restoration, and thematic extension, we further propose a research agenda that maps the framework's dimensions onto research questions, methods, and observable indicators, offering an actionabl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studies.

Key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pe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 Center, Content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而制度的落地与深化始终是改革的核心难题。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以下简称“实践中心”),并将其列为该改革的重点工作[1]。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到2025年建成300个左右全国性实践中心,带动各地建设一批省级和市级实践中心,形成国家、省、市三级实践中心体系[2];同期发布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指南》又从建设单位、基础条件、重点任务、运营机制与监测指标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3]。政策密集出台,相关研究随之逐年增多。

从政策设计看,实践中心被寄予多重制度期待。它要突破传统校内实训基地“封闭、单一、低效”的困局[4],成为贯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平台载体[5],也被视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改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6]。然而,理想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存在持续张力。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背景下,各中心的建设进度、运行质量与功能发挥差异显著,部分中心甚至陷入“挂牌即停滞”“共建不共管”“有场所无产出”的困境。这些现象引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其一,实践中心如何将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资源,稳定转化为人才培养、社会培训与技术服务成效?

其二, 实践中心的建设与运行是否存在统一范式, 还是必须因应情境差异选择差异化路径?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 实践中心本身是一个复合体, 兼具生态系统、能力平台与正式组织三重属性。既有研究相继引入共生理论、资源编排理论与现代组织理论等分析视角, 但大多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中单独展开: 主体间的结构关系、资源的动态编排与组织的制度设计, 如何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共存并互动, 尚缺乏系统回答。本文认为, 正是这种“结构-过程-设计”相互割裂的研究格局, 使实践中心从“场所”向“枢纽”功能跃迁的微观机制得不到充分解释, 因此有必要构建整合性的分析视角。

基于上述判断, 本文对 2022 年 12 月政策发布以来的实践中心研究成果作系统综述, 行文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交代研究设计与样本构成; 第三部分呈现研究现状的多维图景与演进逻辑; 第四部分考察理论视角的引入、分工与整合; 第五部分聚焦核心议题的深化与争议; 第六部分在评述贡献与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纲领。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检索与筛选

文献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以“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为主题词, 检索学术期刊库中 2022 年 12 月政策发布以来刊发的文献(检索时间: 2026 年 8 月 18 日), 共得 59 篇; 学位论文库与会议论文库的同步检索则未见以实践中心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这一空白本身即传递出信息: 该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积累阶段, 期刊论文几乎是当前唯一的成果载体。筛选遵循“核心期刊全部纳入、普通期刊择优纳入”的原则, 按“题名-摘要-全文”逐级进行, 政策宣传、资讯报道及主题关联度较弱的文本均在剔除之列。最终进入核心分析样本的共 12 篇——8 篇核心期刊论文, 另加 4 篇下载量与被引频次较高、观点具有学术增量的普通期刊论文(见表 1)。此外,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¹等 3 份政策文件作为互证文本, 用以校验学术研究发现与政策设计初衷的契合程度。

有研究者可能会问: 为何未将“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相近关键词纳入检索? 这其中涉及三重考虑。概念边界差异是首要的一条。2022 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虽将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实践中心作为“一体两翼”改革框架下的配套载体并列部署[1], 三者的政策定位却各自独立: 市域产教联合体以产业园区为依托, 侧重区域政行企校协同治理;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侧重跨区域的产业链与教育链对接; 实践中心则聚焦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与技术服务的功能复合[3], 三者不宜混同。样本纯度是第二条理由。若以相近关键词扩检, 大量以联合体、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异质文献将随之涌入, 其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同实践中心存在实质差异; 一旦混入样本, 主题聚焦度被稀释、概念边界被模糊, 内容分析的内部效度反而受损。第三条是遗漏风险的控制。本文在筛选环节辅以引文回溯(滚雪球式检索), 逐一核查样本文献的参考文献, 确认以实践中心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成果均已进入样本; 相近载体的研究仅在论及与实践中心关系时充任背景证据(如冷虹雨将实践中心视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得以运转的支撑点[4]), 不构成独立样本。

同时需要坦承, 样本规模与样本类型对本文结论的效力构成了一定约束。核心样本仅 12 篇, 年度分布又不均衡(2024 年占 7 篇), 编码结果难免对个别高影响力文献较为敏感; 本文勾勒的演进分期与理论格局, 只是基于小样本的探索性刻画, 其稳健性有待文献规模扩大后检验。不过也应看到, 该领域文献总量本就有限(检索仅获 59 篇), 而全部核心期刊成果又以穷尽式纳入, 样本对于“截至检索时点的学术进展”仍具有饱和意义上的代表性。样本类型的偏斜是另一重约束: 规范分析占绝对主导, 实证研究占比不足一成, 本文梳理的“理论视角-解释分工”格局因而主要反映学界的理论主张, 而非经一手经验证据充分检验的结论; 三维整合框架同样建立在理论演绎与二手文本分析之上, 属于待验证的解释性建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构。再者，检索范围限于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实践中心是我国特有的政策概念，外文数据库中的直接成果稀少，这一边界对结论影响有限，但域外类似制度的研究未被系统纳入，比较视野不免受限。期刊发表的时滞也须计入：2026 年刊发的部分成果，实际反映的是更早阶段的建设经验。综合这些因素，本文结论宜被理解为该领域阶段性进展的“快照”而非定论，相关边界还将在结语中申明。

2.2. 分析方法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处理样本文献，编码分三级展开。一级编码提取研究主题，归并为内涵特征、价值功能、现实困境、理论视角、建设路径与评价治理六类；二级编码识别各主题内部的观点聚类与分歧；三级编码则归纳不同理论视角的解释分工及其互补关系。编码完成后，本文再结合样本的年度分布与主题迁移勾勒研究演进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提出未来研究纲领。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re sampled literature
表 1. 核心样本文献基本信息

作者(年份)	期刊(层级)	理论视角	研究类型	核心议题
冷虹雨(202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共生理论	规范分析	建设框架与推进路径
姚远、魏建军(2024)	教育与职业(核心)	-	规范分析	逻辑理路与行动路径
孙静晶、汪鲁才(2024)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	规范分析	价值、困境与策略
蔡晓棠(2024)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现代组织理论	规范分析	组织设计与建设路径
侯德华、朱少英(2024)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共生理论	规范分析	共生机制与建设路径
和光(2024)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	政策解读	分类建设的关键环节
雷世平等(2024)	职教通讯(普通)	-	规范分析	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
孙涛等(2024)	职业教育研究(普通)	技能型社会视角	规范分析	社会价值与建设路径
刁利平(2025)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普通)	资源整合理论	规范分析	资源整合机理与路径
郭峰(2025)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普通)	绩效管理理论	框架建构	绩效评价体系
郑婷婷、陈秋苹(2026)	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教育强国视角	规范分析	价值逻辑与突破路径
周奕珺等(2026)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核心)	资源编排理论	多案例研究	异质性路径

注：期刊层级依据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判定；“-”表示未明确援引特定理论。

样本构成(见表 1)传递出两点信息。年度分布上，12 篇文献中 2023 年 1 篇、2024 年 7 篇、2025 年 2 篇、2026 年 2 篇，与政策推进的节奏大体同步；研究类型上，规范分析 9 篇，政策解读、评价框架建构与多案例研究各 1 篇。可见该领域研究仍以理论阐释与经验归纳为主，扎实的一手经验研究才刚刚起步——后文的评述与展望，即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

3. 研究现状的多维呈现

3.1. 概念厘定与特征辨析

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厘清实践中心的内涵边界。多数研究从政策文本出发，辅以案例观察完成概念建构。孙静晶和汪鲁才的界定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实践中心是由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

等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以政策、资金、技术、人员等资源要素为纽带,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与技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7]。特征归纳方面,姚远和魏建军从四个维度作出概括,即开放性(形态属性)、区域性(地域属性)、产教融合性(价值属性)与实践性(本质属性)[8];孙静晶和汪鲁才的表述更为细致,依次列出建设主体的多元性、建设面向的区域性、建设任务的明确性、建设模式的多样性与建设资源的共享性[7];雷世平等则从基本特征、功能定位与推进路径三个层面阐释实践中心的建设逻辑,主张以功能定位统领建设标准与资源配置[9]。概括角度虽有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种根本特质——实践中心是跨越组织边界、功能复合、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枢纽,而非封闭于院校内部的教学场所。在概念共识之外,分类认知的出现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和光在政策解读中较早强调了分类认知的必要性,指出实践中心涵盖学校实践中心、公共实践中心与企业实践中心三种类型,三者在建设主体、功能侧重与发展路径上理应有所区分[10]。后续研究得以超越“一刀切”思维,正是以此为起点。

3.2. 价值功能的多元阐释

围绕实践中心的价值功能,学界已形成多重阐释。站位最高的一种来自郑婷婷和陈秋苹:立足教育强国的宏观叙事,他们提炼出三重价值逻辑——构建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是内在遵循,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根本目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则为核心追求[5]。经此解读,实践中心的意义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不再只是职教体系内部的一项制度安排。回到操作层面,蔡晓棠将实践中心视为深化职教改革、拉动区域经济与提升育人质量的综合性抓手[6];冷虹雨更看重职教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在她看来,实践中心既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得以运转的支撑点,也是破解职教集团“集而不团”难题的一种组织创新[4]。孙涛等的选择又有所不同,他们将实践中心置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脉络中考察,强调其在优化技能供给结构、促进技能积累方面的社会价值[11]。凡此种种,使实践中心在制度设计、经济服务与育人质量三个维度上的复合功能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3.3. 现实困境的系统梳理

既有研究对实践中心运行困境的剖析,集中在四个层面。一是资源的结构性短缺。资金缺口、设备陈旧与“双师型”教师不足构成典型瓶颈[6][8]:院校财力有限,企业受成本收益约束缺乏深度投入的动力,政府财政拨付机制又未形成稳定预期,实践中心因而难以复现真实生产环境。二是多主体利益协调的困难。政府、学校与企业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企业聚焦利润与人才储备,学校看重育人质量与社会声誉,政府侧重区域发展与公共福祉[12]——目标函数的分歧使合作容易流于形式,“各自为政”“貌合神离”成为常见诊断[5]。刁利平将此类困境凝练为整合理念不强、整合关系不密、整合效率不高与整合环境待改善四重表征[13],恰与上述判断相互印证;围绕成因诊断与机制设计的争议,本文将在第五章作专门分析。三是实体化运行的低效。不少中心定位模糊、组织架构残缺、现代治理制度缺失,理事会等治理安排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实质性撬动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6]。四是学生主体性需求的边缘化。有研究注意到,部分实践中心在对接产业的过程中出现了“重生产轻教学”“重技能轻育人”的倾向,学生的真实学习体验与发展诉求被搁置[6]。这一批评颇具警示意味:产教融合若缺乏节制地滑向工具主义,便可能背离育人初衷。

平心而论,既有研究对实践中心“是什么”“面临何种困境”已形成较高共识;但共识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归纳与描述,要走向深层机制分析,尚需更具穿透力的理论视角。

若以时间为轴重新审视样本成果,研究的演进逻辑同样可辨。2023年可称概念奠基期,当年成果以政策阐释与概念建构为主,共生理论首次被引入[4],关系性分析的基调由此奠定。2024年进入理论扩容期,共生理论[12]、现代组织理论[6]相继登场,价值功能与建设路径的多维阐释集中涌现,一度形成“理

论移植热”。2025 年以来转入情境深化期：资源整合与资源编排理论推动研究从通用模式想象转向情境分类分析[13][14]，绩效评价议题开始破题[15]，教育强国、技能型社会等宏观叙事也抬升了研究站位[5][11]。从“概念奠基”到“理论扩容”再到“情境深化”，这一演进轨迹与政策从“提出概念”到“部署建设”再到“监测评价”的推进节奏大体同频，呈现出政策驱动型学术生产的典型特征。它既是本领域研究快速起势的动力，也埋下了理论供给滞后于实践需求的隐忧。

4. 理论视角的引入与整合

4.1. 共生理论：结构整合的分析视角

在诸理论之中，共生理论被援引得最为频繁。该理论源于生物学，经袁纯清引入经济与社会分析后，形成了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与共生界面构成的概念体系[16]，与实践中心多主体互依互惠的特质颇为契合。侯德华和朱少英将这套概念体系移植到实践中心分析之中：政府、学校、企业等被视为共生单元，其质参量的兼容度决定着共生能量的产出效率；政策、市场、技术等构成共生环境；从点共生到一体化共生、从寄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的演化连续统，则描画出实践中心由松散合作迈向深度融合的可能轨迹[12]。冷虹雨的工作更进一层，提出“五方联动、平台支撑、三维保障”的建设框架，着力强化单元间的相互赋能、界面的深度耦合与环境的正向调适，推动共生理论从概念借用走向可操作层面[4]。共生理论的优势在于赋予研究者一种整体性的关系思维，使人得以将实践中心视为互依互惠的生态系统；然而资源如何在主体间流动、整合并最终生成价值，这一动态过程却非其所长。

4.2. 资源理论视角：从整合机理到编排机制

资源理论视角的引入，恰好补上了上述动态过程的盲区。刁利平基于资源整合理论，将资源集聚、分工合作与知识技术共享界定为三大机理，据此提出“四结合”整合原则，以及政府统筹集聚资源、多主体基于功能定位分工合作、资源开放共享的建设路径[13]。这一工作回答的是“资源如何集聚与共享”的配置问题。资源编排理论(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ROT)由 Sirmon 等提出，其核心主张在于：资源的价值并非天然存在，有赖于“构建－捆绑－利用”的编排行动方能释放[17]。周奕珺等将该理论引入实践中心研究，焦点随之转向动态能力——资源行动被分解为资源结构化、资源捆绑化与资源杠杆化三个纵向贯通的环节，分析重心也从“拥有什么资源”移向“如何编排资源”。更具理论增量的是，该研究将产业情境作为关键变量纳入分析，依据“产业链垂直整合度”与“技能迁移度”两个维度区分出四类产教融合情境，并逐一匹配相应的资源编排路径：技术主导产业对应“深度共建－定向交付”，标准化产业集群采用“标准输出－协作分工”，分散的传统产业采取“项目嵌入－知识外溢”，通用技能产业则匹配“平台赋能－规模服务”[14]。从资源整合到资源编排，研究重心由“资源如何集聚”深化为“资源如何被创造性运用”，实践中心研究由此开始放弃对通用模板的追寻，承认异质性情境下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当然，各类路径之间的动态转换条件与演化机理，既有研究着墨不多，仍留有拓展空间。

4.3. 现代组织理论：制度设计的补充视角

蔡晓棠从环境、规模、战略、技术与结构等因素出发，讨论了实践中心组织设计的基本逻辑[6]，其理论内核实为组织权变设计思想——不存在普适的最优结构，组织设计必须回应情境条件的约束。沿着这一视角看，作为一种跨越组织边界的“新型组织系统”，实践中心的效能离不开适配的制度环境、适度的组织规模、清晰的战略定位与富有弹性的结构设计；由此衍生的政策环境优化、有机式组织结构构建与运行保障机制建设等建议，亦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不过，相较于前两种理论，现代组织理论更多停留在“内部设计”层面，属于补充性的制度分析，对实践中心这一特殊组织形态的独特性挖掘不

深,“组织边界模糊”与“多主体权责配置”等关键问题尤其未获回应。

4.4. 从分工走向整合：“结构 - 过程 - 设计”三维整合分析框架

将三种视角并置考察,其分工相当清楚:共生理论长于解释“主体何以共存”的结构条件,资源理论善于揭示“资源何以创造价值”的配置与编排机理,现代组织理论则聚焦于“组织何以有效运行”的设计逻辑。三者并非彼此排斥,只是各自回应了不同维度。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前研究大多守在自己的理论阵营内展开,彼此缺乏实质性对话。而实践中心兼具“生态系统”“能力平台”与“组织形式”三重属性,要完整理解这一复合体,恰恰离不开多种视角的交汇与整合。

需要预先回应的一个质疑是:三种理论分属不同学科脉络,其本体论前提并不天然兼容,简单并置是否有“范式通约”之虞?本文的立场是,三维框架追求的是分析层面的分工整合,而非元理论层面的范式融合。实践中心这一复合对象,为不同理论划定了各自适切的解释领地:当问题指向主体间关系形态时,共生理论最为贴切;当问题指向资源的价值生成时,资源理论更具解释力;当问题指向组织的制度化运行时,现代组织理论更为胜任。整合的合法性来源于对象本身的多重属性,而非理论前提的相互化约;明确各自的解释边界,正是为了避免范畴误置,使三个维度能够通过“接口”而非“混合”实现对话。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结构 - 过程 - 设计”三维整合分析框架(以下简称“三维框架”),作为推动理论整合的分析工具(见图 1)。在三维框架中:结构维(S 维)基于共生理论,关注政府、学校、企业等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兼容度与共生界面的流畅度,界定实践中心运行的基础条件与约束边界;过程维(P 维)基于资源理论,聚焦资源从集聚共享到结构化、捆绑化、杠杆化的动态环节,构成价值创造的核心引擎;设计维(D 维)基于现代组织理论,着眼组织架构、治理机制与激励制度的适配性,为前两个维度的持续运转提供制度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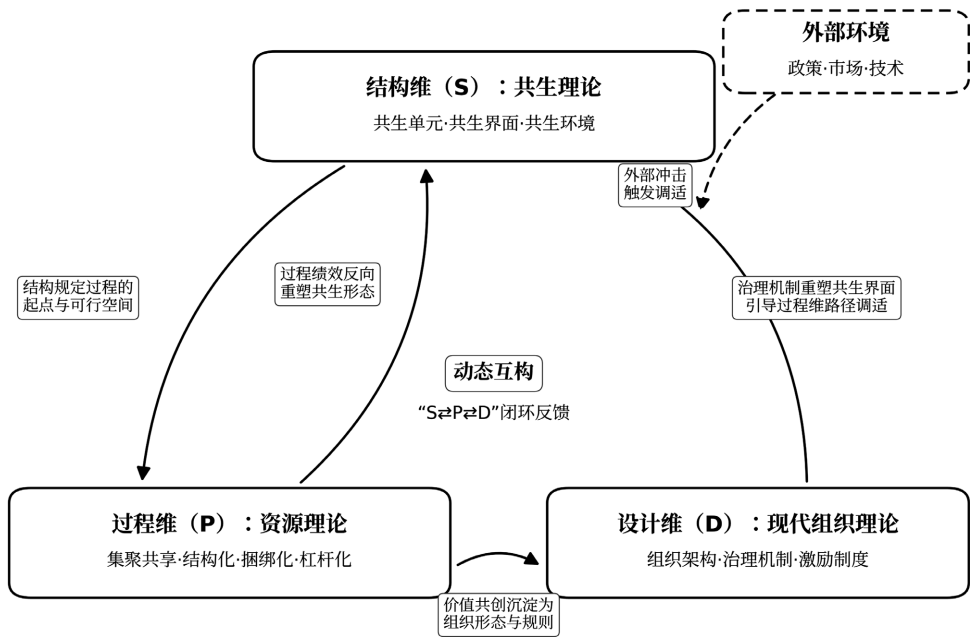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ructure-Process-Design”
图 1. “结构 - 过程 - 设计”三维整合分析框架

三个维度之间并非线性叠加,而是动态互构。其一,共生结构(S)规定资源编排(P)的起点与可行空间,编排绩效又反向重塑共生形态——成功的价值共创可能推动主体间关系由互惠共生迈向一体化共生;其

二,持续的价值共创沉淀为稳定的组织形态与规则体系,组织设计(D)由此获得生成的内生基础,并为资源编排与共生关系提供制度容器与稳定预期;其三,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设计维的治理机制可通过重塑共生界面,引导过程维发生路径调适;其四,政策、市场、技术等外部环境构成三维互动的冲击源,往往经由设计维的治理响应传导至结构与过程维度,最终形成“ $S \rightleftharpoons P \rightleftharpoons D$ ”的闭环反馈。

三维框架能够整合并重释既有研究发现,为实践中心的差异化诊断提供统一的分析语言。但须明确:这种基于样本文献的事后重释并不构成经验检验——用建构框架所依据的原材料反向演示框架的解释力,框架在逻辑上不可能被证伪,演示也就失去了方法论意义。三维框架的真正贡献,在于生成可检验的理论预期;其解释效力有待由此演绎的可证伪命题接受后续经验研究的裁决,这一点将在第(五)小节的命题推导中展开。

三维框架还让回应更深层的理论问题成为可能:现有理论建构多停留在类型学描述层面,对不同路径在何种条件下生成、路径之间能否切换、转换过程如何动态调适等问题探讨薄弱。本质上,路径切换就是“结构-过程-设计”三者适配关系的重新调整,其触发条件、调适机制与绩效后果,正是未来研究需要着力揭示的核心议题。

4.5. 三维框架的理论关联、潜在张力与可检验命题

三维框架统合的三种理论并非简单并列,其内部存在可辨识的逻辑关联与潜在张力。就逻辑关联而言,三者构成一条“条件-行动-沉淀”的因果链。共生理论提供的结构条件是资源编排的前提:没有质参量兼容与界面流畅,资源动作无从展开。资源理论揭示的过程机制是价值实现的枢纽,结构条件唯有经由编排行动才能转化为育人成效。现代组织理论关注的设计安排则是成果固化的载体——短暂的项目合作,只有沉淀为制度化的组织形态,才能获得可持续运行的稳定预期。从时间尺度看,三者分别对应慢、中、快三种变量:共生结构的演化以年计,资源编排随项目周期律动,组织设计中的规则调整相对可即时启动。这种节奏差异,恰好为治理干预留出了“以快带慢”的操作空间。

就潜在张力而言,三者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存在三处分歧,值得正视。其一,结构决定与能动建构之争:共生理论倾向于将共生形态视为质参量兼容度的自然结果,带有结构主义色彩;资源编排理论强调管理者的战略行动与主观能动性,认为资源价值依赖有意识地编排方能释放^[17]。其二,整体论与要素论之分:共生理论以关系整体为分析单位,现代组织理论更关注组织内部可分解的设计要素。其三,开放与封闭之别:共生理论与资源理论将环境视为内生于分析的变量,现代组织理论传统上则多假定相对封闭的组织边界,这与实践中心“跨组织边界”的特质存在龃龉。本文的处理策略是“分工而不隔绝”:以研究问题归属划定理论适用的解释领地,以维度接口处的经验事实仲裁理论分歧。例如“结构决定还是能动建构”之争,在三维框架中即可转化为可检验的问题:质参量兼容度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编排行动的选择空间?如此处理,张力便不再是框架的缺陷,而是驱动经验研究的问题发生器。

基于上述逻辑关联与潜在张力,以下从三维框架演绎出四条可证伪的研究命题,使“问题发生器”的功能具体化:各命题涉及的观测指标可对照表2相应维度选取。

命题1(结构约束路径):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兼容度约束资源编排路径的选择空间——兼容度越高,“深度共建-定向交付”式深度编排路径被采用的可能性越大;在兼容度低的情境中强行采用深度编排路径,其绩效将低于“项目嵌入-知识外溢”等浅度路径。

命题2(过程沉淀设计):实体化组织形态与治理规则的生成以持续的资源编排绩效为前提——缺乏价值共创支撑的中心,其理事会等治理安排将趋于形式化,表现为决议执行率低、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规则缺位。

命题3(干预次序效应):对低兼容度情境下的停滞型中心,“设计维牵引结构维”的干预次序(先行

重建治理界面、再以小切口项目激活编排动作)较直接追加资源投入更能提升跃迁概率;次序错配将使新增资源沉淀为“物理叠加”。

命题4(环境冲击与路径切换):外部政策、市场与技术环境的显著变化构成三维适配关系的冲击源;设计维治理响应的速度与质量决定路径切换的成败,响应滞后将导致路径锁定乃至跃迁中断。

上述命题的共同特征在于均可被经验证据证伪:一旦观测结果与命题预期相悖,框架本身即须修正。换言之,三维框架提供的是可检验的研究问题,而非已被验证的结论。

5. 核心议题的深化与争议

5.1. 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

多主体协同是实践中心的鲜明标识,也是困难最为集中的环节。利益协调困境的现象表征已在第三章得到系统梳理,此处不再赘述,以下聚焦成因之争与机制设计。围绕困境成因,学界尚存一处隐性分歧:一方强调财政投入总量不足与拨付机制缺乏稳定预期[8],另一方提示,既有资源若缺乏有效整合,投入增量亦难以转化为协同效能[13]。分歧的实质是“补增量”与“优存量”的优先序之争;而无论侧重哪一端,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等产权安排都无法回避“公益底线与营利激励如何兼容”这一核心命题。问题诊断已较为充分,机制设计的跟进却明显滞后:此类产权安排虽被反复论及[6][8],但其具体操作方式、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的落地路径,仍缺乏透彻的理论阐释与扎实的个案支撑。从三维框架审视,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暴露出的正是设计维与结构维之间的脱节——治理制度未能回应共生单元质参量差异带来的激励相容问题。

5.2. 异质性情境下的路径分化与演化

路径分化是当前研究中理论增量最为突出的议题。既有研究表明,面对四类差异显著的产教融合情境,实践中心须匹配截然不同的资源编排策略,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设模板[14]。这一发现对政策制定具有直接启示:实施分类评价与精准支持,而非以单一尺度衡量所有实践中心,才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其他研究也从不同侧面呼应了这种情境敏感性:孙静晶和汪鲁才强调学校、公共与企业三类中心的不同定位[7],姚远和魏建军主张依据区域类型统筹规划[8],和光着重分类建设中关键环节的把握[10]。可以说,“差异化路径思维”正在成为学界共识。但争议并未就此终结:过度强调情境差异,可能消解建设标准的统一性,放任低水平重复建设;固守统一标准,又可能压制情境适配的弹性。“底线标准+分类指导”的混合治理,或许是兼顾两者的可行折中。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不同路径之间能否切换与演化?在产业升级或政策环境变化的冲击下,原本适配的路径是否要动态调适?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路径分化研究从静态的类型学推向动态的演化分析——这正是三维框架试图提供的分析增量。

5.3. 评价体系与治理机制

评价与治理是实践中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郑婷婷和陈秋苹观察到,当前普遍缺乏将过程性监测与成果性评价耦合起来的机制,难以形成驱动质量提升的改进闭环[5];和光亦主张搭建系统的监测评价体系,明确评价的目标、内容、方案与团队,并着力于持续改进[10]。郭峰新近构建的“内涵-外延”二维绩效评价框架,则从评价内容层面作出了更为系统的探索:内涵评价聚焦学生实习实训、社会培训与技术服务三项重点任务的产出效能,外延评价关注开放共享与要素流动、多元参与与动态管理等保障条件,并强调以“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及评价结果与预算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驱动质量提升[15]。治理层面,理事会治理、实体化运行与混合所有制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蔡晓棠提出构建有机式组织结构,

并建立资源共享、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三大机制[6]。然而, 这些讨论总体仍停留在原则层面: 权力如何配置、冲突由谁裁决、低效如何问责, 这些操作性更强的问题尚未充分展开。究其根源, 评价与治理的深层困难在于实践中心“跨组织边界”的独特属性——以单一组织为对象的传统治理与评价工具, 难以直接适用于这一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混合组织形态。

6.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6.1. 现有研究的主要贡献

概而言之, 既有研究的贡献可归结为三端。概念地基已经夯实——围绕实践中心的内涵、特征、类型与功能, 学界形成了较为清晰且一致的界定。理论框架也初具雏形: 共生理论、资源理论与现代组织理论相继引入, 推动研究从经验描述进入理论建构层面, 分析纵深明显加强。此外还应看到, 研究者已超越对统一模式的想象, 基于产业特性与技能属性的差异化路径分析获得认真对待, 正成长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6.2. 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

与贡献并存的, 是同样明显的局限。理论整合的不足首当其冲: 不同视角之间缺乏有机对话, 迄今尚未形成兼顾“结构-过程-设计”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经验研究的纵深也显得有限——如表1所示, 12篇样本文献中多案例研究仅1篇, 实证取向成果占比不足一成, 样本规模与追踪时间均难称充分, 实践中心从建设到运行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揭示不够。学生视角的相对缺位同样不容回避: 研究目光多聚焦于政府、院校、企业等“供给端”, 学生的真实学习体验、能力增值与主体需求则少人问津。凡此局限, 既制约了对实践中心的系统理解, 也构成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纲领的现实依据。

6.3.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评析, 本文主张后续研究以三维框架为理论统领, 循“理论深化-方法拓展-视角补位-议题延伸”的逻辑展开, 将分散的研究议题统摄于统一的问题域之下。

纲领要具有可操作性, 还须将三维框架同研究方法的选择衔接起来。为此, 表2以框架维度为线索, 把各维度与两个横切要素(学生、数字化)同代表性研究问题、可行研究方法和可观测指标一一对应, 供后续研究直接取用。方法组合遵循三条线索: 社会网络分析用以刻画结构维的关系形态, 历时性案例方法用以捕捉过程与互动的动态演化, 追踪调查与学习分析则用以测量学生维度的能力增值。下文四条主张, 均可在这张表中找到落点。

第一, 理论深化, 即推进三维框架的操作化与命题检验。这是整个纲领的基石。第四节(五)已从框架演绎出四条可证伪命题, 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将其操作化: 细化结构、过程与设计之间互构关系的测量方案, 明确各命题成立的边界条件与竞争性解释, 进而以经验证据作系统检验。无论检验结果如何, 连同其可能引致的框架修正, 都将推动研究由类型学描述进入机制性解释。

第二, 方法拓展, 即在整合框架指引下开展历时性追踪研究。纵向案例研究不应止步于过程描述, 更要捕捉“结构-过程-设计”三者在关键转折点上的互动与演化, 从而揭示路径形成、巩固与切换的动态机理。就分析策略而言, 可先以关键事件技术识别推动或阻碍实践中心发展的转折性事件, 再运用时序分析将发展历程划分为若干阶段, 进而比较不同阶段三维要素的配置形态及其演变轨迹, 最终提炼出路径演化的因果链条。

第三, 视角补位, 即把学生作为能动者纳入三维框架。在既有的框架性讨论中, 学生多被视为设计维的“产出”, 是制度设计的最终承载对象; 本文则主张, 将被边缘化的学生要素复位为贯穿三维循环

的能动主体。就结构维而言, 学生及其学习共同体本身就是共生单元中的特殊一类: 其学习意愿、参与深度与流失率直接塑造着共生界面的质量, 学习体验的持续恶化会侵蚀校企合作的民意基础与声誉资本, 乃至动摇共生结构的稳定性。切换到过程维, 学生的学习反馈与能力增值构成资源编排成效最直接的信号——编排动作是否有效, 最终须由学习过程检验, 而学生“用脚投票”式的选择又会反向修正院校与企业的编排决策, “编排-反馈-再编排”由此形成闭环。至于设计维, 学生不应仅是治理的客体, 还应成为治理的参与者: 学生代表进入治理机构、学习评价嵌入质量监测、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制度设计, 都是育人逻辑嵌入组织规则的具体方式。具体分析时, 可借鉴情境学习理论与现代学徒制理论, 将学生视为实践中心这一“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18], 考察其在真实生产与服务情境中从边缘向中心逐步深入的轨迹, 以及这一过程对其职业认同、专长发展与就业质量的综合效应。唯有让学生回到“循环之中”, 使“育人成效”成为框架的核心反馈回路, “产教融合”方能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产教协作”, 回归其教育本位。

Table 2. Future research agenda guided by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methods and observation indicators

表 2. 三维框架导向的未来研究议程：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观测指标

框架维度	代表性研究问题	可行研究方法	可观测指标示例
结构维(S)	共生单元质参量兼容度如何测量? 共生模式沿何种轨迹演化? 结构条件如何约束路径选择?	社会网络分析; 多案例比较; 定性比较分析(QCA)	合作协议与联合项目密度、主体互动频次、界面交易成本、合作关系存续率
过程维(P)	资源编排动作如何随产业情境分异? 编排链条在哪些环节失效?	纵向案例研究; 关键事件技术; 过程追踪	共建课程与产线数量、混编团队占比、定向交付率、技术服务收入
设计维(D)	何种治理与产权安排能兼容公益底线与营利激励? 评价闭环如何驱动持续改进?	比较制度分析; 政策试点准实验; 制度文本量化分析	理事会决议执行率、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规则完备度、评价结果与预算挂钩强度
$S \rightleftharpoons P \rightleftharpoons D$ 互构	路径生成、巩固与切换的触发条件和机制是什么?	历时性追踪研究; 组态分析; 系统动力学建模	关键转折事件序列、三维要素配置的阶段性组态及其绩效
学生(横切能动者)	学生参与如何反向塑造编排动作与共生结构? 能力增值如何测量?	追踪调查问卷; 学习分析; 叙事访谈	技能认证获取率、学习投入度、职业认同水平、就业质量
数字化(元变量)	数字技术如何重构连接方式、编排效率与治理形态?	数字民族志; 平台数据分析; 行动研究	数字界面活跃度、数据要素流动速率、虚实融合度、数据驱动治理水平

注：学生与数字化为贯穿三维框架的横切要素，故不单列为维度，而以横切行列示。

第四, 议题延伸, 即把数字化作为贯穿三维框架的元变量。数字技术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 它更在重构三维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在结构维上, 数字平台、数字孪生等技术突破物理边界, 重塑共生界面的形态: 共生单元的连接方式从“场所依赖、面对面”转向“平台化、泛在连接”, 互动频率与界面带宽不再受制于地理邻近性, 分散产业情境下的低兼容度难题由此获得新的化解通道。在过程维上, 数据要素的注入改变着资源编排的效率与模式——资源的结构化识别可依托学习分析与企业生产数据实时完成, 捆绑化可经由虚实融合的课程体系与产线实现, 杠杆化则因数字资源的可复制性与低边际成本而获

得规模效应。设计维的变化同样深刻: 监测评价可由周期性人工报送转向实时数据看板, 跨组织协同可依托数字合约降低交易成本, 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网络化。这些变革或将推动实践中心从“物理场所”向“虚实融合枢纽”跃迁; 数字鸿沟、数据权属与算法治理等衍生风险, 同样应进入研究视野。此外, 德国跨企业培训中心、新加坡“技能创前程”计划等域外实践亦可纳入比较视野, 以便在制度差异中甄别中国实践中心模式的独特机理与可迁移经验。

7. 结语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为观察我国产教融合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本文基于核心期刊与代表性普通期刊文献的梳理, 呈现了实践中心研究的进展图景、演进逻辑与核心争议, 并尝试以“结构-过程-设计”三维整合分析框架统摄既有分歧与未来议题。引言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 至此可以作出回应。关于多元主体资源如何稳定转化为育人与服务成效, 既有研究表明: 这一转化依赖共生结构提供的界面条件, 依赖资源编排形成的动态机制, 也离不开组织设计给予的制度保障——三者任一缺位, 转化链条便会中断。关于建设是否存在统一范式, 异质性路径分析的回答是明确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设模板并不存在, 路径选择必须与产业情境、区域禀赋相适配, 并随主体关系与外部环境的演化而动态调适。需要坦承的是, 本文的分析样本限于期刊论文与政策文本; 截至检索之日, 中国知网尚无以实践中心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与会议论文, 这一样本边界源于领域本身的发展阶段, 而非主观取舍。眼下实践中心建设正全面推进, 研究成果的载体日趋多元, 本文结论有待在更完整的文献基础上接受检验, 三维框架的解释效力亦需后续经验研究验证。我们期待, 这一框架能够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 推动实践中心研究从描述走向解释、从分散走向整合。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一般课题“高职数智财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K24YG3290332)。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2022-12-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2026-08-18.
- [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 2023-07-0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307/t20230717_1069319.html, 2026-08-18.
- [3]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指南[EB/OL]. 2023-07-29. <https://zj.chinaafse.cn/c/2023-07-29/1831.shtml>, 2026-08-18.
- [4] 冷虹雨. 基于共生理论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框架与路径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31): 41-46+73.
- [5] 郑婷婷, 陈秋苹. 教育强国视域下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的价值、羁绊与突破[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2): 42-47.
- [6] 蔡晓棠.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下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23): 6-12.
- [7] 孙静晶, 汪鲁才.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 价值、困境与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23): 13-17.
- [8] 姚远, 魏建军. 论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逻辑理路与行动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4(1): 58-64.
- [9] 雷世平, 谢盈盈, 乐乐.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基本特征、功能定位与推进路径[J]. 职教通讯, 2024(2): 33-40.
- [10] 和光.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的关键点[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23): 1.
- [11] 孙涛, 邵长兰, 杜娟, 等. 技能型社会建设视角下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24(11): 35-40.

- [12] 侯德华, 朱少英. 共生理论视域下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路径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29): 75-80.
- [13] 刁利平. 基于资源整合理论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路径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0): 84-87.
- [14] 周奕珺, 李俊, 王国栋. 从“场所”到“枢纽”: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融入产教融合网络的异质性路径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6(9): 37-48.
- [15] 郭峰.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绩效评价研究[J].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 2025(5): 5-10.
- [16]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7-47.
- [17] Sirmon, D.G., Hitt, M.A. and Ireland, R.D. (2007)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273-292.
<https://doi.org/10.5465/amr.2007.23466005>
- [18] Lave, J. and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355>